

# 普通校工见证复旦近百年的发展 回忆我的父亲张阿长

◆张庭柱

父亲生于1907年,卒于2002年11月,享年95岁。可惜他走的一周前我离开上海去墨西哥公干。噩耗传来,那种悲伤的感觉就好像体内被抽干了,痛心得难受,我恨这冥冥注定的安排,那么多年在国内守望,都相安无事,偏偏我远去南半球数天,亲爱的父亲走了,不能送他最后一程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父亲是江苏淮安人,地道的苏北人,1921年他13岁时,家乡连年受灾,庄稼颗粒无收,他跟随祖父长途跋涉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,居住在苏北人聚集的曹家渡棚户区。父亲从没上过学、读过书,起初只能做苦力,在附近三官塘桥上帮忙推人力车黄包车赚点小钱,后来他又租了一部黄包车,在上海滩开始了艰辛的车夫生涯。

父亲生活里的浓重一笔是和一个人发生了交集。一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外出揽活,一位戴眼镜、提着皮包的斯文人坐上了他的车,让父亲拉到徐家汇附近的学堂,到达后他让父亲两小时后再来拉他回家。父亲拉了几个客人后又回到原地等候。那人果然又来乘车,父亲便拉他到目的地。就在父亲要离开时,那人嘱咐父亲明天到时还来拉他去上课,就这样一来二去,彼此有了了解,他就是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。在父亲的回忆里:李校长见他话不多、人憨厚、跑得快、拉得稳,就包用了他的车。

李登辉在复旦大学服务40余年,他祖籍福建同安,出生于印尼,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,后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。他曾亲赴东南亚筹集大量华侨捐款,回来后购得上海北郊区70余亩土地,一举奠定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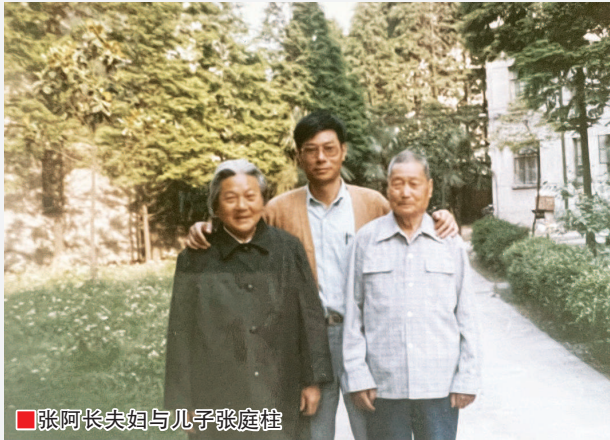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20年代,李校长外出的交通工具以父亲的黄包车为主;30年代,南洋华侨捐给李校长一部轿车,从此他出行基本上以车代步,父亲更多的是成为他的随扈。抗战时期,李校长留守复旦大学上海校区,父亲始终跟随左右,帮他跑跑腿、送取文件、外出购物。如李校长喜欢四川路武昌路“广茂香”的广东烤鸭,父亲常前往购买。父亲为人忠厚,深得李校长信任,他唤我父亲“阿长”,父亲则称他“校长”。周围人士都仿校长叫父亲张阿长,久而久之,父亲的原名张怀勇反而被人遗忘。父亲不识字,他还是放心让父亲到银行替他存取钱财,每次都亲写字条,让父亲前往办理。

父亲曾跟我说起,李登辉为复旦大学呕心沥血,只要有真才实学、对复旦办学有用的人才,他都亲自登门拜访,请他们到学校讲课或聘用他们。父

在我看来,世上最恒久的关系莫过于父亲和儿子的关系,通俗来讲,父子之间拥有最亲密的关系。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,但踌躇再三,迟迟难以下笔,也许正因亲密所以难写。父亲的日常生活看似普通,却又一直影响着我以及兄弟姐妹。要从他普通点滴的生活细流中找出激励我们、影响我们人生的东西,确实存在,又难以捉摸。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,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酝酿的时间都要长。



张阿长夫妇



张阿长夫妇与儿子张庭柱

亲在上世纪30年代曾随同李校长到山阴路大陆新村拜访了鲁迅,邀请鲁迅来复旦讲课。最终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了两次,讲的是革命文学。1935年,父亲护送年近花甲的李校长乘长江轮西上,参加重庆复旦中学的成立大会。路过南京,李校长身体不适,曾下船在著名的金陵饭店歇息了两天。

李校长夫人名叫汤佩琳,夫妻感情笃深、琴瑟和鸣,育有两女,令人惋惜的是,李夫人和一对女儿不幸先后离世。李校长把痛苦埋在心底,专心致力学校教育,再续弦。后来他把自己的侄儿李贤正过继为自己的养子,两个人生活在一起,白天李校长忙于上课和校务,父亲便担负起对他的照顾和陪伴,他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父亲帮忙,当时李贤正住在复旦徐汇村32号,直到1948年李贤正结婚后搬离复旦大学到徐家汇生活。

李校长曾于1936年被迫辞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。1937年,抗战爆发,复旦大学辗转去到四川重庆嘉陵江边的北碚。李校长担任留守上海的复旦校区负责人,父亲依旧跟随左右。抗战胜利后,复旦复员回到江湾,其时校长为他的学生章益,章校长对前校长的旧人照顾有加,父亲被安排至复旦大学徐汇村担任门房,章益校长住在徐汇村31号,正对着门房间,母亲在章校长家帮佣。

抗战爆发以后,复旦大学迁移至重庆北碚,数学系教授崔明奇夫妇将随校前往,走时只带了随身衣物,家具及钢琴等都无法带走,他委托父亲看情况处理。父亲把崔家所有东西全部搬到门房后面堆放起来。直到抗战胜利结束,崔明奇夫妇从陪都重庆复员回沪,父亲将一应物品“完璧归赵”,崔教授喜出望外,非常感激。

至此两家关系自然很好,每年春节父母亲都会带我去给崔明奇夫妇拜年,虽然我当时还小,但一直都记得徐汇村村长崔伯伯真诚的笑脸。直到

1958年崔明奇教授因病去世,埋葬于江湾公墓,此后每逢清明,父亲都让我穿戴整齐,骑自行车带我去给他扫墓。

这种友谊延续至崔伯伯夫人林津秀身上。只要林老师有事,她招呼一声,父母就上门相帮。他们膝下无子,1967年,林伯母因病去世,我父母借崔家老友李振麟先生的夫人卢老师等一道送别了林老师。

我1950年出生于复旦大学徐汇村(现为第二宿舍),那时,父亲被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工作,负责水银的清洗处理。记忆中有一些事情常在脑海浮现。

父亲在高等学府工作,但是不识字,他积极参加学校扫盲班,认真工作,成为复旦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发展的中共党员。父亲深知读书的重要,一直督促我们子女认真学习,让我们用他的借书证去复旦图书馆借书看,看到有合适的学习教材就带回来给我们复习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人们纷纷捐钱、出力支援志愿军,父亲主动提出降薪5元,从每月53元降至48元。母亲对此事虽然嘴上嘀咕,但抱怨之余更加精打细算、勤俭持家。为了补贴家用,母亲经常到学生宿舍,帮学生洗衣服。

记得有天晚上,父亲很晚都没回家,饭菜早已凉了,母亲就命我去学校看看。我知道父亲的上班地点,就在物理楼楼梯边上第一间房间,那里有台专门从事清洗水银的机器,我看见父亲正在忙碌着。他说:“蔡(祖泉)叔叔的电光源实验室研制高压汞灯,需要大量纯净水银,只有我加班加点,才能供得上实验需要。”他告诫我,凡是答应过别人的事情,就是再辛苦也要做到。

发小李北宏曾告知,他听物理系教授潘笃武教授谈起:当年张阿长做的工作有危险性,他曾提醒过老张千万当心。这事只有张阿长肯干,也只有他能干好。也是老天眷顾好人,张阿长活到95岁高寿。

正是因为水银有毒,物理系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,免费向他提供每天

一磅牛奶,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不容易,父亲自然不愿专享,都是拿回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喝。

父亲有个习惯,每天早上起床泡上一杯淡淡的盐白开水,温温的时候喝下去。据说,它可以洗胃清肠,我有时也会来上一杯,效果不错,可惜我没有长久坚持。父亲最大的爱好便是喝点小酒,常常让我去国权路合作社购买零拷的果子酒,回来的路上我也会偷喝几口,记得有次多喝了几口,回家以后和小时玩伴打弹子,一蹲下竟然摔倒,晕乎乎得醉了。长大以后我酒量不错,能喝整八两白酒,恐怕跟我小时练过的“童子功”有关。

父亲抽烟一直都用烟斗,这和崔伯伯一样。那么多年过去了,他叼着烟斗、眯眼翘着二郎腿、静静坐在椅子上的形象,总让我想起黄永玉的那张自画像,两个人都是方V形脸,风度颇有相似处,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家里6个孩子都在上学,仅靠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一家的花销,我才十来岁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在上学,个个能吃会喝。鱼肉买不起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,平时只能粗茶淡饭。父亲带领我们在自家后院养鸡、下蛋,还种了蔬菜、毛豆。收获季节到了,新鲜蔬菜有时吃不完,送给邻居教授家品尝,那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,鲜嫩爽口,至今让我回味。毛豆摘下来,父亲和我们在灯下剥毛豆,一剥就是一大碗,第二天用来炒雪里蕻咸菜,标准的本帮菜,既下饭还有营养,大家都爱吃。正是靠着这些蔬菜和鸡蛋,一家人健康、平安、快乐地生活,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。十几岁的孩子肯定贪玩,不喜做家务,尤其是这种枯燥无味的手工活,可是有父亲陪着,或者说我们陪着父亲一起做家务、聊家常,那一幕是我最难忘的回忆,至今还时常在脑海里浮现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复旦大学受到冲击,复旦当时任党委书记王零被揪斗批判。父亲对变化莫测的运动目不暇接、有些迷茫,听到学生高亢激昂的揭发王零的种种“罪行”,父亲很是愕然,从不解到不满继而愤怒。终于在一次在学校批斗会上,他毅然走上舞台,挥起左手(父亲是左撇子)打了王零一记耳光。事发突然,王零一个踉跄、差点跌倒,场下也一片哗然,大家都没有想到平时一个毫不起眼、默默无闻的老校工竟然打了堂堂知名学府的掌舵人。

我那时还在上初中,听闻此事,也感到不可思议,父亲处世为人一向老实巴交、没有脾气,这一巴掌确实惊人。我家当时住在第二宿舍,王零家住第一宿舍,两宿舍大门正好相对,仅隔着一条国权路,两家人出门时常会不期而遇,尤其是王零的儿子和我们是同龄人,遇到时颇有些尴尬。

数年后,学校秩序恢复正常。有一次父亲出门上班,王零同志也刚好走出第一宿舍大门,父亲主动走向他,低声说了些话。两人一起走着、聊着,分手时王零主动伸出手掌,两人握手后分开、各奔东西,这一幕正好被我在无意中目睹。事后,我问起这事,父亲淡然地回答说:“那场误会,主动说开也就没事了。”当时,王零已调任同济大学任党委书记,位高权重。家父的主动示好,王零同志亦有风度,认这个老复旦,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2000年,时逢复旦大学95周年校庆,已经移居海外的李贤正先生应学校邀请前来参加庆典。李先生重归故里,向学校询问父亲的去向。那时,父亲在上海凉城路一家养老院入住。第二天,家姐带着李贤正去看望他。父亲当时已经90多岁,患有阿尔茨海默症。两位老人见面的时候,父亲一反常态,居然露出高兴的笑容,两眼直直看着李先生,并示意先生坐在床边的方凳上。李先生参加完学校庆典,再次单独来到养老院看望家父。后来养老院服务员告诉家人,李先生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,与父亲进行着无言的交流。我想,他们情深意笃,一定是回忆几十年前一同度过的时光。

父亲作为一名校工,见证了复旦近百年的发展,有人说父亲也是真车,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老爷车,对此判断我也感觉当之无愧。从当年徐汇、常德路,到如今的江湾,他在一而终,留下他为复旦兢兢业业服务的车,苦活、累活、险活抢着干却从无怨言和自我标榜。他将其一身和复旦捆绑,同呼吸、共命运。他看似“渺若星辰”不起眼,却又不可或缺,得到办学李校长乃至李贤正的认可。

## 骆倩:“她力量”让她在化妆品行业闪光

骆倩作为希思黎(Sisley)中国市场的资深产品经理,见证了美妆行业在中国的崛起与变迁,更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出色的领导力,成功打造了多个爆款产品。从踏入美妆行业到如今成为希思黎中国

市场的核心管理者,骆倩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。

2014年,骆倩从欧莱雅实习生

做起,经过一年的历练正式成为欧莱雅的一员,这段经历为她在美妆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,尤其是在产

品营销和市场调研方面积累了经验。2016年,骆倩加入了一家专注于电子营销的广告公司,负责为美

妆品牌提供线上投放策略。2019年,骆倩成功晋升为希思黎产品经理,并负责希思黎黑玫瑰护肤系列的规划管理工作。这款产品在她的精心策划下,迅速成为公司的第二大爆品。